



創新制度機制 加快培育新質生產力

議論風生

陸文英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印發《關於深入推進改革创新改革試點深化改革創新擴大開放的意見》，《意見》主要聚焦四大領域，「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推進金融、技術、數據等賦能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健全科學化、精細化、法治化治理模式」。從而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創造更多可複製、可推廣的新鮮經驗，更好發揮深圳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重要引擎作用和在全國一盤棋中的輻射帶動作用，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作出貢獻、提供範例。

今年是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5周年，作為改革開放的先鋒，深圳在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大潮中，以創新為旗，改革探路，擔負起開拓中國式現代化示範區的歷史重任。重點突破管理和體制與全面改革開放

不相適應的阻礙，建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優質要素資源引力場和集聚地。推動粵港澳合作新進程，培育發展長期資本、耐心資本，深化數據交易規則以及場景探索，着力建設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創新發展試驗區、國家低空經濟產業綜合示範區。今天已有48項經驗全國推廣。前海、河套兩大平台強化深港規則銜接，前海累計形成835項制度創新成果，河套聚焦國際科研合作機制進展理想。

國家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

近年，部分西方媒體質疑中國改革開放向何處去。深圳的最新動態與重點部署，彰顯我國在全球經濟變局中，透過新政策、新規則、新戰略建構起新一輪對外開放的立體化戰略框架的決心。

事實上，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明確以制度創新為核心，打通教育、科技、人才、金融、產業、數據等關鍵要素堵點，建構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

制的戰略規劃。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更提出「無論外部環境如何變化，始終堅持對外開放不動搖」。根據最新政策部署與實施動態，中央將新一輪改革開放以「深層制度創新」為主線，透過打通要素堵點、擴大規則對接，為高質量發展注入制度紅利，同時注重防範系統性風險，確保改革行穩致遠。核心聚焦於制度型開放、要素市場化改革、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創新等領域，加速改善產權保護、市場進入、公平競爭等基礎，強化統籌開放安全，促進金融、數據、技術等賦能實體經濟，激發各類經營主體活力，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在政策方面，全面取消製造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措施，抓緊推進電信、教育、醫療等服務領域開放。優化吸引外資政策，及時回應外商合理訴求，在優化營商環境、完善服務保障等方面出台更多務實舉措。在金融領域試行對接國際高標準規則，擴大金融業制度型開放，允許外資金融機構

在華開發新金融服務。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打造透明、穩定、可預期的制度環境。擴大單邊開放，啟動新一輪自貿協定談判。優化入境免簽政策，與26國實現普通護照全面互免簽證，對38國單方面免簽，拓展全球自貿網絡，促進文旅等服務貿易成長。

破解機制銜接的深層障礙

在科技與產業融合方面，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支持科技領頭企業主導技術攻關；探索新型研發機構薪酬市場化，賦予科學研究團隊更大自主權。數據與金融協同方面，逐步有序推進資本項目高水平開放，建立多通路跨國投資制度，完善跨國融資宏觀審慎管理。推動經濟開發區設立離岸創新基地，探索「海外研發＋境內轉化」模式，支持直接申報省級科創載體，加強智慧財產權國際合作。結構性改革深化，產業升級，推動傳統產業改造、新興產業布局；健全土地、資料、技術等

要素流動機制，激發市場活力。

國家堅定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必將為香港帶來更多機遇，香港須依託國際規則銜接優勢，進一步加快與灣區內地城市的制度機制對接，鞏固提升國際樞紐地位，助力內地與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對接。尤其是深化金融改革開放方面，要更有效地實施「三聯通、三便利」措施，加強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升級措施，強化人民幣國際化支撐體系，提升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深度與流動性。在推動產業升級與新成長點方面，聚焦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生物醫學等領域，攜手深圳，輻射大灣區，不斷開拓國際創科中心建設，培育新質生產力。

香港正積極發揮「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作用，未來需持續破解制度機制銜接面臨的深層次障礙，透過科創賦能與區域協作重塑全球競爭力，不斷釋放「一國兩制」紅利，助力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

港深與「新界北」的未來想像



政策建議

胡恩威

每逢周末，各個陸路口岸都上演一幕幕耐人尋味的場景。香港居民如潮水般湧向深圳，當中大部分人不是為了商務出差，而是為了到深圳體驗那些在香港較難體驗的生活滋味——價格服務合理的餐飲、服務周到的美容院、創意十足的文化空間。這股北上消費的熱潮絕非偶然，它是兩種城市發展模式對比下的必然選擇，是深圳規劃智慧對香港傳統模式的選擇。當一些市民選擇深圳作為休閒娛樂目的地時，我們不禁要問：能否將這種成功經驗引入香港？特別是對於與深圳一河之隔的新界北，這裏本應是港深協同發展的最前沿，卻長期處於發展的邊緣地帶。

香港北區與深圳福田、南山隔河相望，這片土地本該是兩地交流的橋樑，卻因歷史原因變成了「被遺忘的角落」。基礎設施老化、產業老化、人口流失，這種發展停滯與深圳河對岸的日新月異形成鮮明對比。深圳用四十年時間從小漁村蛻變為國際大都市，其城市規劃既吸收了西方理念，又融入了中國特色，創造出獨特的「深圳模式」——高效、靈活、以人為本。反觀香港，尤其是北區，過去一段時間受困於從回歸留下的官僚體系和碎片化規劃思維，不同部門各自為政、缺乏整體協調，導致發展步伐緩慢。當深圳已建立起完善的軌道交通網絡和城市配套時，北區居民仍要忍受交通不便和生活設施匱乏之苦。

強化協同發展規劃

深圳模式的核心優勢在於其整體性和創新性。走在深圳街頭，人們能直觀感受到這座城市的設計智慧：綠道系統貫穿全市，公園綠地觸手可及，文化設施與商業空間無縫銜接。這種規劃不是簡單照搬西方「功能分區」理念——將居住、工作、娛樂嚴格分

離——而是創造了混合用途的活力社區。深圳的成功還在於其強大的執行力，從設計到落地，周期短、效率高，政府與市場形成良性互動。更值得一提的是，深圳將科技元素融入城市肌理，電子支付、共享經濟、智能交通已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種全方位的生活體驗，正是吸引香港人北上的磁石。若將這種模式移植到北部都會區，完全有可能打造出一個比深圳現有區域更具示範性的新型城區。

港深協同推動北部都會區發展，這絕非天方夜譚。可考慮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建立創新合作機制，成立聯合規劃委員會，就統籌土地利用、產業布局和基礎設施建設提出意見。具體而言，可借鑒深圳經驗在北部都會區引入**高效審批制度**，**簡化土地開發程序**；也可以引入**混合用地模式**，**打破香港僵化的分區規劃（zoning）限制**；**參考深圳的「15分鐘生活圈」理念**，讓居民在步行範圍內滿足日常需求。產業方面，可結合香港的科研優勢與深圳的製造能力，打造跨境科技走廊；農業領域，除引入先進的都市農業技術，也可以借鑒深圳經驗發展觀光農場和有機種植；文化旅遊則可依託香港國際化和深圳創新力的雙重優勢，創造獨一無二的文化體驗。這種合作不是誰主誰導的問題，而是優勢互補、互利共贏。

內地的規劃為北部都會區的建設提供了全新思路。與西方強調功能分離的規劃理念不同，內地當代城市規劃更注重整體協調和多元融合。雄安新区的「藍綠交織、水城共融」規劃理念、蘇州工業園區的**產城融合實踐**，都展示了這種規劃哲學的先進性。對北部都會區而言，可充分吸收這些經驗，打造一個沒有明確邊界的多功能區域——農田旁是研發中心，科技園區內設文化場館，生態保護區與休閒設施並存。這種打破常規的空間組織方式，恰恰符合當代社會流動、融合的發展趨勢。更重要的是，中國式規劃強調政府的主導作用和長遠眼

光，能夠避免市場短期行為導致的碎片化發展，確保區域整體利益最大化。

新界北的轉型面臨諸多挑戰，但機遇更為珍貴。法律差異、標準不一、利益協調等問題確實存在，但在國家全力推進大灣區建設的背景下，這些障礙完全可以通過制度創新來克服。香港需要擺脫「恐懼」的過時心態，以開放姿態擁抱與深圳的合作。深圳方面也可將共同開發新界北視為服務國家戰略的重要舉措。當兩地政府真正形成合力，新界北完全有可能成為「一國兩制」下區域合作的最佳範例，為粵港澳大灣區乃至全國提供可複製的經驗。

「香港特色」結合「深圳模式」

站在深圳河畔眺望新界北，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片待開發的土地，更是一個關於未來的想像空間。在這裏，港深兩地的界限將逐漸模糊，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充滿活力的跨境生活圈。香港居民不再需要周末北上尋找優質生活，因為在家門口就能享受港深協同發展的成果；深圳人才可以自由南下，在北部都會區的科研機構施展才華；遊客則能體驗獨一無二的文化融合之旅。這片土地將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動展示，證明社會主義規劃智慧能夠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模式更優質的城市生活。

邊界的存在本是為了區分彼此，但在全球化與區域一體化的今天，邊界的意義正在被重新定義。港深之間的邊界不應是阻隔，而應是交流的接口、協同發展的起點。北部都會區的建設，政府需要打破陳規的勇氣和開拓創新的智慧。當「香港特色」結合「深圳模式」時，我們有理由期待一個既保留各自優勢、又超越原有框架的全新城市範式誕生。這或許就是中國式現代化給予世界的最真實啓示：**發展沒有固定模式，只有不斷創新突破，才能創造真正屬於人民的美好生活。**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海外法官助力鞏固香港法治優勢

上周，立法會根據基本法第90條的規定，同意批准任命新西蘭前法官楊偉廉爵士為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

楊偉廉爵士於1997年至2010年在新西蘭高等法院任職，後晉升至新西蘭最高法院，直至2022年退休。他是繼2023年獲委任的前澳洲大法官祈顯義，和2024年獲委任的前澳洲聯邦法院法官歐頌律之後，近三年內第三位獲委任的海外非常任法官。楊爵士經驗極為豐富，必將如祈顯義和歐頌律一樣，為終審法院的審案工作帶來助益。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向立法會表示，楊偉廉地位崇高、聲譽卓著，執業範疇亦十分廣泛，涵蓋刑事、競爭法及稅務等案件，將會對終審法院工作有很大貢獻。

終審法院目前有兩份非常任法官名單，分為本地與海外。本地名單包括四位本地退休法官：包致金、陳兆愷、鄧國楨及司徒敬；海外名單則有六位法官，除新加入的楊偉廉，以及祈顯義和歐頌律外，其他三位是來自英國的賀輔明勳爵、廖柏嘉勳爵，和來自澳洲的甘慕賢。

香港終審法院審理案件時，通常由五名法官組成合議庭，固定成員包括首席法官張舉能，李義、霍兆剛、林文瀚三位常任法官，以及從上述兩份法官名單中選一名，或偶爾兩名非常任法官。隨著楊偉廉的加入，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總數增至十位，應能應付終審法院工作。

自1997年終審法院成立以來，不斷有來自澳洲、加拿大、新西蘭及英國的法官獲委任為非常任法官，無疑是因為這些國家在普通法系中享有崇高地位。然而，2020年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後，部分海外法官因受到當地反華政客施壓而對赴港任職有所顧慮，因此未來擴大招募範圍無疑是明智之舉。

例如，有英國籍法官一直遭到當地反華政客的施壓，攻擊抹黑他們擔任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一些法官選擇了屈服。2022年，英國政府要求在英國最高法院任職的韋彥德勳爵和賀知義勳爵，辭去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職務；時任外交大臣特拉斯聲稱，英國在職法官繼續在香港法院任職「不再合適」；時任司法大臣拉布也以類似手段施壓。兩位法官最終辭任。並非人人都能如賀輔明勳爵、廖柏嘉勳爵一般立場堅定，着實令人遺憾。

以法論事

江樂士

特拉斯此舉也違反了國際法官協會通過的《世界法官憲章》，該憲章明確規定必須保障法官的個人自主權，法官不應受到任何「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壓力、威脅或干預」。

既然在英國等地納賄遇阻，就更應將選才範圍進一步拓寬。基本法第八十二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終審權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終審法院可根據需要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因此，終審法院可考慮向印度、愛爾蘭、馬來西亞、新加坡、南非等普通法適用地區招募人才。

無論如何，海外法官對香港司法體系的貢獻有目共睹，終審法院的判決也不時被英國等其他普通法地區引用。終審法院常任法官霍兆剛在2017年英聯邦法律會議上表示，「自1997年以來，他們（海外法官）集體對香港法律發展影響至深」，並強調終審法院的地位「因他們的參與而提升」。作為內行人，霍兆剛的評價可謂獨到，而非溢美之詞。

香港作為具有全球視野的國際化都市，終審法院的招募海外非常任法官，無疑有助鞏固香港法治優勢和司法公信力。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同樣出類拔萃，但他們乃至整個法律界，仍會受益於頂尖外援的參與。正正是因為海外非常任法官對於維護香港法治和維持香港的國際地位所作出的貢獻，境外反華勢力才企圖透過政治施壓迫使他們辭任。

儘管個別人士意志薄弱，未能抵受來自當地反華政客的壓力選擇辭任海外非常任法官，但只能證明這些人「只能同甘不能共苦」，他們絕不代表全部海外法官。終審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任命制度行之有效，若因個別法官的離任，就輕易改變任命制度，無異於因噎廢食。無論如何，香港需要的是有原則、能在風浪中堅守的海外法官。

我有充分理由相信，海外非常任法官未來的貢獻將一如既往地重要，絲毫不遜於過去28年。在全球局勢緊張之際，他們的角色可能更為重要。因此，凡期冀香港成功者，都應支持這一安排——不僅有助鞏固香港法治優勢，更可為「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保駕護航。

註：原文刊登於《中國日報》，原題為「海外法官助力香港司法體系」

前刑事檢控專員

「美國世紀」終結是歷史的必然

二人文章的基本觀點是——「秩序取決於國家之間穩定的權力分配、影響國家和其他行為者行為並使之合法化的規範，以及說明支撐秩序的機構。特朗普政府已動搖所有這些支柱。世界可能正進入一個混亂時期，只有白宮改變路線或華盛頓出現新的政權後才會穩定下來。但正進行的下降可能不只是暫時下降，可能是一頭扎進渾水裏。特朗普為了讓美國更強大而反覆無常、誤導性的努力，可能會不客氣地終結其統治——美國出版商亨利·盧斯（Henry Luce）第一個稱之為『美國世紀』。」

特朗普動搖國際秩序支柱

上述觀點分兩部分。前部分的論斷，即「特朗普政府已動搖維持國家之間秩序的所有支柱」，這是站得住的。問題在於後部分，即「特朗普可能是終結『美國世

紀」的推手」。如此論斷，過於誇大特朗普個人因素。

文章在闡述基本觀點時，強調特朗普破壞了二戰以來美國主導建立的國際秩序，損害了美國的「軟實力」。兩位作者認為，那一切是「美國世紀」的根基，可能被特朗普不客氣地終結。

然而，個人總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活動的。

2024年8月24日，我在《大公報》發表《為什麼說特朗普大概率重返白宮？》稱——二百年後，回頭看當前美國正在發生的民主政制解體，如果以歷史長劇來比喻，那麼，特朗普是「反派」。但在當前，主導美國政治舞台的，是「反派」。正是從這樣的角度看，我斷言特朗普大概率當選美國第六十屆總統。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對16世紀至20世紀全球經濟政治社會格局全面深刻調

整。「美國世紀」由盛至衰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既表現為美國內部經濟政治社會結構陷入空前嚴重的危機，也表現為美國全球霸權地位從20世紀最後10年的巔峰急劇衰落。

美霸權地位急劇衰敗

特朗普不可能力挽狂瀾於既倒。2017年1月至2021年1月，他第一個美國總統任期，未擺脫美國下降軌道。2025年1月，他開始第二個美國總統任期，力圖恢復19世紀末、20世紀末帝國主義來重振美國，不僅充分暴露他是在歷史的反面，而且充分暴露美國內部無力阻遏美國的頹勢。小約瑟夫·奈和羅伯特·基歐漢呼籲美國尋回其權力來源，則是企圖以自由主義重建美國。

習近平主席深刻揭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變，全球和平赤字、發展

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不斷惡化。籠統地說，是全球和平、發展、安全和治理問題發生發展的速度和程度，愈益超過全球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具體地說，是美國全球霸權不可阻擋也無可挽回地衰敗。

習近平主席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破解全球「四大赤字」提供中國方案。為此，習主席再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三大全球倡議」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行動細化為人類發展共同體、人類安全共同體和人類文明共同體，其中，發展是人類共同的目標，安全是發展的前提，文明是落實發展和安全的土壤。

與此同時，中國堅定有力同美國展開全面深入持久較量。「美國世紀」終結是歷史的必然。

資深評論員、博士



知微篇

周八駿

著名的「軟實力」觀念創立者小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Jr.）的遺作，是他與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國際事務名譽教授、哈佛大學國際事務中心研究員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合撰的《美國長世紀的終結——特朗普和美國權力的來源》（The End of the Long American Century—Trump and the Sources of U.S. Power）。此文徵得奈的家人允許而最後定稿。在奈去世約一個月後，6月2日發表於《外交》網站。

羅伯特·基歐漢以其著作《霸權之後》（After Hegemony, 1984年著）聞名國際關係學界，是國際關係學新自由制度主義學派主要學者之一。